

一枝奇葩：《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

孟昭毅

20世纪以来，中外文学交流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其主要表现为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日益增加，可以说已进入文学交流的绵密期。中外文学交流的研究也发生重大变化，研究的时间开始从古代进入当代；交流的主角也由古人转移到今人；交流的向度由一维发展到多维；交流的程度由浅层进入深层；交流的方式由文本书写到直面对话；交流的渠道从间接变为直接。文学交流使相互怀疑隔阂的对方，成为谅解融通的朋友。在这种发展的大趋势下，文学交流与研究的文字记录，即文学交流史研究的书写风起云涌。在如此众多已达汗牛充栋的同类著作中，山东教育出版社由中国著名学者钱林森和周宁主编的皇皇十七卷逾千万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其中由著名印度学学者、中印交流史家郁龙余担纲和刘朝华共同撰写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下文简称《中国-印度卷》）以70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具体地书写了中印文学交流2000余年有案可稽的历史长卷。

此书开本大气，装帧精美，淡雅不俗，诱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愉悦轻松的心态里通读全书后，透过字里行间，不难看到撰写者的精心构思和春秋笔法。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隐含着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中印文学交流研究的写法与同类著作相比，颇多新意，在看似不经意的叙事中，却能发现独具史家风范的匠心。中印文学交流史的著作此前有多种写法，包括研究专题型的、论文集录型的、提纲挈领型的，以及文学文化综合型的，等等，像《中国-印度卷》这种图文并茂、注释新颖、包罗万象但又专攻文学交流的著作还属首次

面世出版。仔细分析研究，可以归纳出该书在书写与研究方法上的诸多独到之处。

第一，全书的结构颇具新意，呈现出丝线串珠、集腋成裘的写作特点。作者根据中印文学交流史发展的总趋势，即其历史事件的发展时隐时现、忽明忽暗、曲折透迤的特点，实事求是地用纵向垂直的时间线索，串起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思潮、作品、作家或文学交流史绕不开的重要人物，犹如丝绸之路上的绿洲，被穿梭其中的商旅编织串联成一条又一条的通衢大道。具体而言，全书以佛典汉译、印度向中国传输古代文学信息为中印文学交流史的起始点，以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度的译介、中国向印度传输当代文学信息为终结点，不仅串起一个又一个的文学“绿洲”，而且向世人揭示出古代主要是印度向中国传播文学文化，而现当代主要是中国向印度传播文学文化的双向大趋势。尽管这种双向交流还有着诸多的不平衡，但是它毕竟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向，即只有互相吸纳融摄的文学交流才是世界文学健康发展的大方向。作者对这些“绿洲”不只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进行了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不同的特点，给人一种学术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高度和理论建构。

这条线索串联起的各个文学“绿洲”主要有：以佛典为代表的佛教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形成、题材的变化、形象的塑造、语言的表达等方面的影响；佛教文学与中国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中国翻译学由此所形成的特点；印度的《佛本生》和《五卷书》等叙事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与变异等的研究；印度两大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衍变情况与研究；印度古典梵剧和中国戏剧的多种源流之间的联系与发生共鸣的关系等研究；印度现代文学巨擘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在中国的介绍、翻译与研究等，这些文学“绿洲”成为中印文学交流历史长河上的重要节点和驿站，成为研究者难以逾越的学术生命之源。它们自然而然地被作者信手拈来，用作连缀中印文学交流的辞彩华章，用来提升中印

文学交流研究史的研究深度，使中印文学交流有了继续向纵深开掘的可能。

《中国-印度卷》中被中印文学交流史上的这些文学“绿洲”串接起来的，还有身体力行于文学交流的中国大师：季羨林、徐梵澄、金克木、刘安武、黄宝生等，他们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将印度文学翻译介绍的成果奉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将自己对印度文学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告知于中国学术界，使印度文学文化在中国得以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认同中国上述学者的主张，同样倡导文学交流的印度大师主要有：谭云山和谭中，师觉月和奥修，以及拉贾·拉奥等，他们笔下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学文化，使印度学术界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并使之成为中印文学文化昆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谭云山和谭中父子，他们虽为华裔，但在向印度介绍中国文学和汉学并使之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学方面，更可谓是同舟共济、砥砺前行的历史巨人。他们的光辉业绩彪炳史册，成为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历史地标。中印文学交流史上的这些标志性人物，让原来模糊不清的历史遗存，变成清晰可辨、鲜活可感的形象，并化为鼓舞后人进行不懈努力的阳光雨露；使“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感悟，变为“天雨曼陀罗”的行动。

第二，《中国-印度卷》既然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之一种，所以就要有明显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著作的写法。全书写作非常重视中印文学交流的史实材料，其中既有文字的，也有实物的，还有图像的，多重证据共同指认。材料异常丰富，观点、论点颇具说服力，给人一种论从史出的厚重感。书中在写到“谭云山与印度现代汉学开拓”一节时，无论是对谭云山的生活细节还是文字记载材料，都是目前学界最权威而又最前沿性的观点。其中许多文献都出自原稿现存于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藏的《谭云山文献》。另外对于谭云山“募集图书，建印度首个中文图书馆”一事，作者郁龙余不仅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而且在2011年初春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邀请赴印度考察

讲学期间，还专程去了桑蒂尼克坦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反复翻阅了它的图书目录，仔细查看其中的藏书，流连忘返。当他发现其中不少的藏书都是国内罕见的善本书和孤本书以后，非常感慨，并摄影留念。这一切都成为作者写作这一节文字的重要依据。

在书的后记中，作者还记述了自己写作中的一个“尊重史实，穷搜不舍”的花絮。“《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的写作，史料极为重要。当读到《季羨林全集》第10卷时，发现了《〈中国普列姆昌德研究论文集〉序》一文，心中十分惊喜。《中国普列姆昌德研究论文集》是我未掌握的一本印地文论文集。于是，打电话给北京的陈力行老师。他说：印象中出过此书，但是他手头没有此书。他答应替我向在外文局印地语组做过负责人的陈士樾老师打听一下。过几天，他来电话说：陈士樾老师也有印象，但时间已久，具体记不清了。他手头也无此书。

“于是，我打电话问北京大学刘安武老师，情况出现了转机。他告诉我，印象中有这本书。自己的一篇文章被收入书中，他应该有此书。要我给他一点时间，好好找一下。结果，第二天晚上，他打电话来告诉我：的确出过这本书，时间是1988年6月，他还收到过160元稿费。这些都有文字记录，所以不会有错。刘老师答应，好好在家里找一找，找到书，就什么都清楚了。

“过了两天，还没等我打电话，刘老师又来电话，说书没有找着，但情况更确实了。他还说，收了他的文章《普列姆昌德的文学观》，印地文是他自己译的，稿费是800元，不是160元。因为当时怕钱的来路不明不好，所以都一一记录在册。他已给一位同班同学打了电话，仍无头绪。但是，他还会再努力。叫我等他消息。

“一天，刘老师来电话，说情况有进展，此书的编者之一是钱永明，比我高五个年级，也有了外文局人事处的电话。但是，钱永明出差去了，人事处又不肯告诉钱的电话，说是隐私云云。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外文局人事处，一位先生接的电话，说认识钱永明，并把他的座机、手机号码告诉了我。挂了电话，我立即按约定，将钱永明的电话告诉

刘老师。于是，事情进入了快车道。

“又过了两天，刘老师来电话，说和钱永明联系上了，他家里就有此书，但只有一本，不能送人，只能复印。我说，你们年纪都大了，路又远，最好请我的学生，在北大念博士的朱璇跑一趟。刘老师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下午四点，朱璇来到刘老师家，取得了钱永明的地址和电话。在外文局复印是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朱璇借到书后到专门商店复印了两本。刘老师依然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定要出 18.5 元的复印费。朱璇拗不过他，只得收下。她来电话向我说起此事，不无感慨。我告诉他，刘老师一贯如此，时间长了会习惯。时值第三届中国-南亚（文化）论坛在四川大学召开。谭中先生从美国赶到北京，再飞成都与会。朱璇就托谭中先生将复印的《中国普列姆昌德研究论文集》带到成都。11 月 24 日晚，谭先生在四川大学红瓦宾馆房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

“这样，历经数月，我们顺藤摸瓜，穷搜不舍，终于如愿以偿。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们不禁想起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郁龙余：《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604 至 605 页。以下引自该书的不再注明，只标出书名和页码）

《中国-印度卷》的作者就是这样，以事实为依据，将中印文学交流点点滴滴的信息汇集起来，通过一些具体可感、图文并茂，甚至是口述史式的书写表达，使人看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印文学交流的历史画卷。这种写法既保留了文学交流史的真实痕迹，又合乎史学研究与写作的学术规范；不仅富有创意，言犹在耳，而且使人感觉历历在目，豁然开朗。

第三，此书的写作方法具有探讨元点理论的实践特色。“元”为初始之意，元点即为最初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此点”。这种理论在此书的写作实践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作者写作时非常注重“原点”，即原来的本色的那一点，那是一些未经过人工雕

琢的原发性的材料和观点。作者以此为依据展开论述和写作，刨根问底，溯本求源，找到最原始的材料。正如《文心雕龙》所说：“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例如玄奘到底是否奉推崇老子的唐太宗李世民之诏将《道德经》译汉为梵的公案，历代有争议。书中有极为详尽的论证，从《广弘明集》到《佛祖统纪》，从《大正藏经》再到《续高僧传》，作者旁征博引，最终表明了玄奘翻译了《道德经》的观点。《道德经》译成梵语后是否传到印度，并无明文记载，也不见印度有传本。作者认为“《道德经》译成梵文之后传到印度，毋庸置疑”（《中国-印度卷》，第429页），并提出三点令人信服的理由：“至于在印度不见传本，原因并不复杂。印度历来不重文本，气候炎热潮湿，纸质文本不易保存。更重要的原因是，《道德经》的译汉为梵，是当时政治和外交的需要，传到印度后作为外道的经文，是很难传之久远的。”（《中国-印度卷》，第429页）作者的立论审慎且具有说服力。

其次，《中国-印度卷》的作者写作时还非常注重“源点”，即“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那个“源头”。只有从源头流出的活水才能汨汨不断地流到尽处。作者运用了大量取自“源头”的鲜活材料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将自己要表达的思想说清楚、讲明白。在书中的“师觉月与现代印度文学开拓”一章中，作者对师觉月的研究可谓材料翔实，评价中肯。尤其是对师觉月的学习经历、师承传统、学术成就等材料，信手拈来，连缀成篇，使我们发现认识了一位印度汉学大家。作者对师觉月在巴黎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赛尔万·列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毕业论文《中国佛教圣典》，这一现代印度学者第一部以汉文资料为主的专著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对深为国际汉学界推崇的师觉月的汉学著作《中印千年文化关系》这本298页的英文论著，共8章的内容逐一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认为“师觉月在他的这部作品中，从宗教文化等角度探索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奥秘，有助于两国人民理解和梳理两国的文化遗产”（《中国-印度卷》，第409页）。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些源点的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本书写作时非常注重“原典”中的材料。作者注意原始文本中的经典实例，不是主观猜测、臆想天开，也不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而是注重文本阅读，寻找事出之因，有理有据。坚持在阅读原典中发现蛛丝马迹，在分析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真知灼见。真正做到“米淘三遍出清水，书读三遍露真容”。印度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自佛教传入以来，始终没有停息。20世纪以来，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研究蓬勃发展，盛况空前。作者经过仔细考量，仅举从原典中读出的一例来说明，“即印度民间故事国王误杀取水青年演变成中国二十四孝中郑子的故事来看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和演变过程”（《中国-印度卷》，第457页）。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年轻的十车王因天黑打猎，一箭误杀取水青年。死前青年告诉十车王他父母皆为盲人，请他告之。青年父母最后跳进儿子的火葬堆而升天。这样一个孝道思想并不突出的故事，随佛经《六度集经》、《睽子经》、《佛说睽子经》、《杂宝藏经》等和《法苑珠林》而传入中国，“睽子”也成为故事最早的汉文译名。魏晋时期，睽子故事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成为孝子的典范。“南北朝时期在寺院流行的‘唱导’和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俗讲’将睽子故事传播益广。”（《中国-印度卷》，第459页）到了宋代，勾栏瓦肆和“说话”艺术的兴盛，使去佛教化的睽子故事基本定型。“到了宋金时期，睽子故事已经是二十四孝中没有争议的一部分了”（《中国-印度卷》，第459页）。作者在论证这一问题时，除了运用了书籍“原典”以外，还举出石窟壁画、敦煌残卷、书画合璧的藏画、石棺线刻、砖雕、墓道壁画等材料为佐证，用以说明这一印度故事发展成中国孝道故事的复杂衍变过程。

第四，作者将本书写作放在线形的“一带一路”和圆形的“文化圈”互相交叉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注重其中形成的某些文学交流的交流区域，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区域。在这些交流区有许多中印文学交流的汇合点，将作家作品置于这样的地理历史坐标上，进行多维的立体考察，作者得出了使人难以置疑，又令人认同可信的新结

论。例如，中印戏剧艺术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本书作者认为：“中印间存在两千年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交流，将中印古代戏剧交流史研究清楚了，就几乎完成了中国古代戏剧交流史的一半任务。”（《中国-印度卷》，第154页）多种观点不为过誉之说，因为中国戏剧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古代主要是和印度戏剧文化进行交流，而中西戏剧之间实质上的交流则从近现代才开始。中印戏剧文化交流古代主要以陆路丝绸之路为通道，而后海上丝绸之路又成为二者相互关联的渠道。原本中印分属以儒道思想为信仰的东亚文化圈和以印度教佛教为信仰的南亚文化圈，而“一带一路”恰恰成为连接和贯通两大文化圈的重要通道。在这相互串联的诸多交汇点上，中印戏剧艺术上演了一幕幕颇为壮观绚丽的场景。

印度古典梵剧出现的时间比中国戏剧要早，印度戏剧理论著作《舞论》自然也比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出现要早。《中国-印度卷》的作者从“形象”一词在两国戏剧文化中的内涵、使用及相互关系入手，钩沉索疇梳理中印戏剧文化交流史。而后又从《舞论》和歌舞、佛教剧本、梵剧剧本等入手，阐发“中国戏剧印度输入说研判”的问题。作者从20世纪上半叶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和郑振铎的《戏文的起来》论起，又论及台湾学者裴普贤的《戏剧起源中所受印度的影响》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最后论及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和季羨林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在戏剧发生和起源时“中印戏剧应该还没有机会发生交流”，“但是也不应无视中国戏剧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印度戏剧和整个印度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国-印度卷》，第138—169页）。

中印在“一带一路”和“文化圈”形成的交感区域中，另一个交汇点是印度现代的“汉学”发展为“中国学”，这也是中印文学交流双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作者认为，印度的汉学最早可追溯到20世

纪初戈达达尔·辛格的日记《在中国的十三个月》（《中国-印度卷》，第483页）。他以被英印当局派到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士兵身份，真实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印度汉学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内容诞生于20世纪初的加尔各答大学。在印度，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属于中国学范畴。作者认为：“谭中是印度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重要见证人和操盘手。……研究好谭中，对于了解印度的汉学和中国学转型及其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中国-印度卷》，第484页）而作者郁龙余则是中国目前最了解谭中，并与之相识互信的人，所以书中的不少材料都出自与谭中交往的第一手资料。作者不仅详尽搜集到印度学者大量的汉学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印度中国学和佛学的研究重镇国际大学所支持的一大批学者的重要成果也耳熟能详。此外，继国际大学之后兴起的研究中国学的重要阵地——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研究成果，作者也是了如指掌。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中国学中的文学研究的比重在不断增加，其中“鲁迅作品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强项”（《中国-印度卷》，第488页）。书中列举了历次学术会议和会议论文中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了印度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中国学专家马尼克博士的研究成果。书中还极为翔实地历述了作为郁龙余好朋友的印度当代著名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如墨普德、邵葆丽和狄伯杰等。这些人的学术成就极为让人刮目相看。他们的特点是都有多部专著、译著问世，有诸多学术论文发表，并在大学任教，是当代印度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主力军，颇有代表性。

由上述可知，《中国-印度卷》一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该书作者堪称是中国的印度学大家。领衔撰写者郁龙余教授深得北京大学做学问的真传，面对古代中印文学交流的复杂局面，他尊重历史，以史籍为立言之根本，书写了中印两国历史上文学交流的不朽篇章。他在现当代中印文学交流中以在场者的身份，亲力亲为地如实记录了中印文学交流一次次生动的场面。他曾多次往来于中印两国之间直接进行文学文化交流活动，不愧为新闻报道称为的中印“民间大使”。这

种既是研究印度文学文化的专家学者，又是文学交流史践行者的双重身份，保证了《中国-印度卷》一书丰富的学术含量，和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我们作为读者渴望今后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领域里见到更多质量如此上乘的同类著作问世。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